

标签理论视角下困境家庭青少年社会疏离的形成机制研究

韦伊嘉, 高 静*

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柳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1日

摘 要

相对于普通的青少年, 身处困境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陷入社会疏离的困境, 然而外界施加的各类负向标签会长期干扰他们的心理成长与正常社会融入。本研究基于标签理论视角, 以困境家庭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界定困境家庭青少年、社会疏离、标签内化等核心概念, 通过聚焦同辈、校园环境、社区生活与家庭等场域来分析该群体标签的生成路径, 并阐释青少年社会疏离的形成机制。困境家庭青少年长期被他人贴上负面标签后形成的身份界定, 极易引发青少年标签内化与自我否定, 习惯性的回避人际交往, 逐步切断自身与外界的联系, 造成社会联结断裂。本研究从认知重构、搭建同辈支持平台、营造去标签化社会环境等维度, 提出社会工作干预优化路径, 为解决困境家庭青少年社会疏离困境, 帮助其社会融入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标签理论, 困境家庭青少年, 社会疏离, 社会工作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Alienation among Adolesc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eling Theory

Yijia Wei, Jing G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Desig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韦伊嘉, 高静. 标签理论视角下困境家庭青少年社会疏离的形成机制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9): 110-118. DOI: 10.12677/ass.2026.159734

Received: July 2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1, 2026

Abstract

Compared to ordinary adolescents, those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re more prone to social alienation. However, various negative labels imposed by society can persistently hinder thei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normal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the labeling theory framework, focusing on adolesc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to define core concepts including adolesc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ocial alienation, and label internalization. By examining key contexts—including peer relationships, school environments, community life, and family dynamics—it analyzes how social labels are formed and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adolescent social alienati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shaped by prolonged exposure to negative labels often leads to label internalization and self-denial, resulting in habitual avoidance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 gradual severance of social connections. The study proposes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encompassing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establishment of peer support networks, and creation of a destigmatizing social environment,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social alienation among this popul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Labeling Theory, Adolesc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ocial Alienation, Social Work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青少年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身份的认同阶段，同时也是社会角色习得的关键，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接受的外部定义和群体归类等方式，会深刻影响其社会认知的状态。青少年日常身处多重社会场域，简单的群体区分容易不断叠加刻板印象和差异化对待，这种情况会演变成带有偏见色彩的负向标签。当前我国困境家庭青少年是青少年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群体，如今出现了许多低保、离异家庭等这些家庭状况导致亲子互动缺失或者家庭经济压力累积，给青少年的心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他们面临着比同龄人更多的压力和挑战[1]。在这种无法享受正常家庭温暖和关心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很容易形成感情冷漠、烦躁、孤独的性格[2]。由此困境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在生活中接收到特殊归类与标签化评价，进而表现出逐渐不愿与人交往，公共参与意愿降低，呈现出典型的社会疏离特征，这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与社会化发展。

困境家庭青少年的社会疏离问题并非简单的家庭环境衍生，而是社会标签建构与行为认知强化共同推进的结果。本研究以西南部地区老旧城区为分析情境，该类区域邻里关系紧密，标签在熟人社会中更容易被放大，而且相对固化的社会资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青少年的人际联结能力。研究中以标签理论为核心，聚焦困境家庭青少年的标签认知与行为演变过程，探讨标签影响社会疏离固化的形成机制，并从社会工作角度尝试提出去标签化和重构社会联结的调适策略，以期从社会建构维度对青少年社会疏离问题的学理解释，为理解当代青少年社会化适应困境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2.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

2.1.1. 困境家庭青少年

本研究参考优秀学者观点, 将困境家庭定义为受结构性贫困、家庭功能失调、社会支持网络断裂等多维致困因素影响, 家庭系统长期处于资源剥夺状态的家庭。研究中困境家庭青少年主要界定为年龄处于 12~18 岁, 因家庭存在经济贫困、单亲离异、隔代监护、监护缺失等因素的青少年群体。本文将困境家庭主要分为经济匮乏型家庭, 指家庭收入低, 物质资源短缺; 结构残缺型家庭, 包括单亲家庭、父母一方长期缺位; 功能失调型家庭, 家庭成员长期产生冲突或冷漠等。成长于困境家庭的青少年, 大多容易出现自我认同感弱和父母沟通隔阂较深, 难以处理同辈关系, 同时学习动力不足, 对待各种事情心态消极等现实问题。其家庭困境成因复杂多样, 比如父母重病或存在残疾的情况, 父母因为各种原因丧失基本的劳动能力, 父母离婚或者死亡等一方缺失, 一方因服刑或外出打工的情况, 以及父母虽在身边但缺乏对孩子的关爱照顾等[3]。

该群体的状态并非自身问题, 主要源于家庭结构性压力困境, 困境家庭青少年长期面临物质资源短缺、家庭教育缺位等问题, 在多元社会互动中这类人群自我认知尚未成熟, 很容易成为负向标签的附着对象, 是社会疏离问题的高发群体。

2.1.2. 标签内化

标签内化是标签从外部评价转化成个体自我认知的过程, 青少年在长期、反复的负向标签刺激下, 逐渐去接纳和认同外界赋予的负面定义, 由此标签内化也变成了连接外部贴标与个体偏差行为的关键变量。困境家庭青少年在反复被他人以“差生”“问题孩子”“没出息”等标签定义时会相信这些评价是真实的, 会将“他人的负面评价”转化为“本身是不受欢迎”的认知时, 最终将外部标签固化为稳定自我概念的心理过程, 标签内化完成后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选择会主动贴合负面标签设定。

2.1.3. 社会疏离

社会疏离是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且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在社会工作、心理学等领域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社会疏离”, 其源头可追溯至 Biordi 教授的首次界定。它描述的是个人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 或是在参与社交活动时遭到排斥, 进而产生孤独、低落的情绪[4]。

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脱离了自己所在的群体, 他们没有能够与外界进行良好的互动, 这种“脱离”既可以是主动地选择离开, 也可以是被动地放弃或者是被消极排斥, 在这些情况下往往伴随有孤独和无助等主观情绪, 以及社交回避等客观行为的改变。而根据其他学者的观点, Finelay 强调社会疏离不仅仅表示个体的主观感受, 又对其增加了客观属性, 包括与家人、朋友交往的态度等[5]。因此, 社会疏离具有两个维度, 主观疏离体现为孤独感和被排斥感以及对社会的疏远态度, 从客观层面来看当个体经历迁移, 处于缺乏安全感状态时可能会出现切断所有社交的情况, 这也就构成了社会疏离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6]。因此在本研究视角下, 社会疏离并非只是单一的一种心理情绪, 而是包含自我、人际和社会三个维度的联结断裂状态。

2.2. 理论基础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埃德文·雷伯特和霍德华·贝克尔等人相继提出了标签理论[7]。贝克尔在《局外人》(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1963)一书中提出“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 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解释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8]。坦南鲍姆的观点对于标签理论的形成和

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烙印”是他在标签理论中延伸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一个人的不良标签是由公众施加的社会描述,而他会因为无法摆脱标签带来的罪恶印象真正变成被描述的人[9]。传统标签理论认为社会偏差行为并非个体天生特质,而是社会定义与标签赋予的结果,标签是指有些人给另一些人施加的符号或固定看法,主要是对被施加者不利的符号或污名,个体偶然的非常规行为属于初级越轨,具备临时性和偶然性特征,个体一旦被贴上消极标签,会在社会评价的压力下逐渐认同标签内涵,进而产生符合标签预期的行为。在长期标签压力下逐渐认同负面身份,主动贴合标签并且做出持续性偏差行为,完成次级越轨转化,最终实现负面身份与偏差行为的固化。

标签理论认为许多人之所以成为“有问题的人”,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该理论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认为越轨行为并非个体行为本身的特质,而是社会互动过程中,主体对个体行为进行标定和贴附标签的结果,因此困境家庭青少年很容易被贴上消极标签,并带有一定的歧视和贬义[10]。这种标签并非单纯的身份界定,在日常互动中青少年困境家庭特征容易被外部环境简化概括,并转化为固有的身份标签,在校园社交和师生互动中形成刻板印象,使困境家庭青少年陷入“被特殊化”“被边缘化”的困境[11]。当这类标签在一定范围内被反复强化与传播时,个体将逐步接收并内化认知,形成消极的自我身份判断,然后通过回避社交和脱离群体的方式规避标签压力。

3. 困境家庭青少年负向标签的主要生成场域

3.1. 同辈群体形成的日常标签

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自我认知主要依赖同辈的评价,同辈群体是青少年日常社交最核心的场域,也是负向非正式标签最主要的生成载体,相较于长辈的评价,同辈之间的群体定义和社交排斥对青少年有更直接的影响。在同辈群体的日常互动中标签往往以看似随意,但却具有杀伤力的方式被施加,会通过青少年家庭经济条件,穿着打扮,家庭教育模式等维度形成群体对比,困境家庭青少年因家庭条件有限,容易被同辈赋予“贫穷、穷酸”这类标签,因家长疏于管教,被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一些青少年因自卑内向,而且不善于社交,他们的行为举止一旦不合群,就可能被贴上“怪胎”的标签。例如,青少年因穿着陈旧遭到身边同伴的嘲笑,从起初的短暂难堪,在标签的反复强化下逐渐变成被人看不起的无力感,继而主动回避集体场合,不再回应搭话,即便他很渴望融入也选择了沉默。

这类标签多以玩笑和议论的非正式形式存在,重要的是同辈群体中的标签具有传染性,当一个标签被反复提及并得到群体成员的附和,它便获得了公认的地位,被贴上标签的青少年也因此被置于群体的边缘。同辈群体的这些负向标签会形成隐性的群体排斥,比如同辈之间的抱团社交和差异化对待等,让困境家庭青少年持续处于社交边缘的位置。长期的负面群体评价会让青少年初步产生自我怀疑,成为其负面自我认知的初始来源,也为标签内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3.2. 校园环境带来的差异化认知

学校是一个载体,教师的主观认知和学校的管理制度,会对困境家庭青少年形成一种权威性的负向标签,相较于同辈群体的非正式标签,校园更具备了固化效果。有研究指出学校场域中的语言符号以普涉性价值将学生被动分类,非语言符号则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自动逃离[12]。有些教师会存在固化的教育刻板印象,根据学生的家庭背景预判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行为习惯。一些教师在了解到困境家庭学生的家庭情况会容易形成“基础薄弱或者是家庭教育不足”的固有认知,教师可能会因人、因事的不同有选择性给学生贴标签,且这些学生更容易被贴上标签,为此形成刻板印象而影响对学生的公正性评价[13]。所以教师“标签式”的评价,对学生的行为与学业乃至一生的成就都有重要影响,是“社会分层”的“预

演”与基础[14]。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方式和班级管理都在有意无意间生产着差异化认知,困境家庭青少年因家庭支持不足,大多数在学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会产生学习问题,而这种劣势很容易形成“能力不足”或者“态度有问题”的判断。

教学管理中也可能存在资源分配倾斜和缺乏耐心等差异化的对待,学校针对困境学生的帮扶补贴和特殊关爱等政策,很多为了透明化会选择采用公开公示和集体统计的方式落实,这样间接使困境家庭青少年被贴上了标签,强化了一些负向标签的可信度,进一步增强这些标签的贴附效果。

3.3. 社区生活场景的固化标签

社区是青少年长期生活的公共场域,居民之间信息互通性比较强,家庭的经济状况、监护情况和生活状态会成为社区公共认知。困境家庭长期困难的生活状态会让邻里邻居和社区工作人员形成固定印象,并将家庭的负面评价直接转嫁到青少年身上。尤其是邻里间的日常议论和对比评价,他人有意无意的一句“他家情况比较复杂”“少跟他走太近”“他是单亲家庭”,便足以筑起一道看不见的墙。这种模糊的声音起初只是让人模糊的不安,但反复出现后,青少年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在社区评价中已被归入不正常之中,这种来自社区的微妙态度,远比直接的嘲笑更磨人。困境家庭青少年的身份在社区中持续固化,这样长期的社区负面评价会让这类群体受到歧视,导致其在公共社交活动中处于被持续贴标签的状态。对于困境家庭青少年而言,社区中的标签往往与其家庭状况深度绑定,使得他们的任何行为都被置于“果然如此”的解释框架中,加深了既有标签的刻板印象。

3.4. 原生家庭的自我否定标签

家庭本应是个体获得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基础场所,但原生家庭内部的负面暗示与自我否定标签,是所有负向标签中内化速度最快且伤害最深的,困境家庭由于其自身资源匮乏与功能失调,更容易在家庭互动中向子女传递否定性评价。例如父母的经济焦虑、情感缺失或者教育方式不当,这些都可能转化为对子女的贬损性话语,多数困境家庭监护人长期处于经济压力带来的生活焦虑的状态中,自身存在较强的自卑心理,他们会不自觉将家庭的消极情绪传递给孩子,频繁向孩子灌输家里条件差,比不上别人这种负面观念,让孩子从小感受到自卑。

另一方面,部分监护人因为自身生活困境或是交由亲人隔代抚养,这类人会将生活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改变现在的家庭状况,时常出现打压式教育,频繁否定孩子的行为与想法,这样的方式让青少年形成错误认知,让他们认为自己是家庭负担。有案例研究表明特别是在一些留守儿童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往往来自教师的少量反馈和留守在家的儿童监护人的转述。没有经常参与儿童成长的父母如果运用习惯性的否定标签评价孩子,更容易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进而导致亲子关系的生疏[15]。而且父母通过比较教育,试图激发子女上进心,却导致子女陷入“努力到否定,再努力到再否定”的恶性循环,进而产生习得性无助。

家庭内部的自我否定标签,区别于外界被动赋予的标签,是青少年从成长之初就持续接收的内在负面认知,多重外部标签叠加家庭内部标签,形成全方位的负面评价包围,彻底打破青少年的正向自我认知。

4. 从“被标签”到“社会疏离”的形成机制分析

4.1. 外部标签持续加持的运作机制

困境家庭青少年长期处于标签压力环境中,同辈群体,学校,社区环境和家庭这四大场域的负向标签形成叠加效果,构建出了负面评价体系,他们无法通过自我调节规避负面影响。困境家庭青少年的标

签压力主要来源于平常的口头议论、隐性排挤和调侃的非正式标签,在日常社交中这些标签会持续弱化青少年的社交自信。还有学校和社会认知形成的正式标签,通过差异化的资源分配和固化的刻板印象,赋予负面标签的权威性。在这样双重标签的相互作用下,这类群体的身份从个人主观变成公共认知,同时负向标签伴也随着社会的区别对待。困境家庭青少年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些标签带来的负面影响,长时间的标签暗示会让外部负面变得更加强化,时刻冲击着他们的正向自我认知,导致他们从被动接受标签到主动认同这些标签。三种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闭环,困境家庭青少年被贴上问题标签后便很难摆脱这一身份,他们身上的标签如同一副无形的枷锁时刻影响着他们。

标签效应由此通过这三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他人倾向于关注与标签一致的行为而忽视不一致的行为,从而不断去验证标签的正确性。第二种是标签成为解释个体一切行为的基本框架,如果这个人发生了任何行为都被纳入这个框架中去定义他。最后就是锁定,他人基于标签采取针对性的对待方式,但是这种对待方式又反过来诱导被标签者做出符合标签的行为。

4.2. 标签内化产生自我否定

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尚未完全成熟,缺乏独立思考的自我评判能力,对父母、老师、同辈等外界的评价高度敏感,当困境家庭青少年反复接收到“你不行”“你是贫困的”“你没有父母”等标签时,那么在长期多场域负向标签的持续刺激下,困境家庭青少年会对负面标签存在抵触心态,试图通过自我证明来打破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随着标签压力的持续增加,而且没有得到更多正向的反馈,青少年便会慢慢怀疑自己,开始被动去接纳部分负面评价,最终在外部的负面包围中形成标签内化,造成完全认同外界赋予的负面标签。

标签内化完成后,困境家庭青少年形成稳定的消极自我认知体系,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效能感缺失等心理问题,逐渐默认自己是真的存在缺陷,认为自己不配参与集体社交,没有办法获得他人认可。许多被贴上负向标签的青少年逐渐接受“自己一无是处”,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这种内在的自我否定彻底改变了青少年的社交心态,开始产生逃避社交的心态。

4.3. 社交回避行为的持续强化

自我否定的内在认知最终会转化为外在的行为偏差,困境家庭青少年为规避再次被贴标签,主动采取社交回避。青少年因为身上的标签长期在学校和社区中承受偏见和区别对待,久而久之便形成消极的社交趋势,他们认为自身参与人际互动只会遭受排挤与非议,很难获得别人的认可与接纳。为了避免反复遭受心理伤害,通常主动规避各类社交,以自我保护的方式将自己封闭起来。在校园里他们不愿参与班级集体活动,刻意疏远同学,不参加任何团队合作和人际交流,一次次回避同伴的邀约,他在群体中的位置便会移动,这些现象一开始可能被理解为内向,但往后就会被认为是“不太合群”,再往后同伴们会逐渐丧失邀请他的耐心,由此他们身上的一些标签再次得到印证。困境家庭青少年在家中不愿与父母沟通心事,习惯性的“嗯”“没事”“别管我”这样的话语去应对父母的询问。而且困境家庭中的父母也总是希望孩子能够成才,将孩子与别人作比较,用打压式教育增加压力负担,亲子间的情感也因此产生距离。同时他们主动避开公共场合,不愿意参与邻里交往,习惯性呆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想和外界产生任何多余的交集,一点点脱离了身边所有的生活圈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脱节,彻底陷入了自我孤立的状态。

社交回避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机制,困境家庭青少年越是回避社交,证明他们越缺乏正向的社交体验和社会参与经历,他们无法获得别人的正向认可,印证了自身“不受欢迎”的负向标签,得不到外界肯定与鼓励,进一步加深自我否定的想法,社交恐惧与回避倾向也随之不断加重,从而更加抗拒参

与社会互动。

4.4. 社会联结的断裂

长期固化的社交回避行为会破坏困境家庭青少年的社会关系,逐步瓦解同辈、家庭、社区三大社会联结,导致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破坏。在青少年的世界中同辈交往是成长过程中重要的情感支撑,长期刻意回避同伴互动和脱离集体生活,会让他们慢慢被同龄群体区分为不合群,失去同伴陪伴和正向的价值认同,同辈社交关系也会随之断裂。困境家庭青少年的自我封闭,不愿与父母交流沟通,日常相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小事也会导致亲子关系隔阂,那么原生家庭原本具备的情感庇护也在不断地弱化,家庭没有办法为他们抵御外界的负面压力。

以社会资本理论来看,困境家庭青少年会因为同辈网络的排斥而失去日常社交的互助资源,社区关系的疏远则直接切断了非正式支持的来源。这样多重社会联结的断裂,脱离公共生活,回避社区邻里的互动,严重阻碍了困境家庭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他们原本短暂的自我疏离固化为长期稳定的社会疏离状态。当疏离状态进一步固化,标签由外部归因转为自我认同时,困境家庭青少年开始主动拒绝接触和排斥集体活动,并将社会交往视为一种负担时,那么就形成了闭环。他们不再期待从社会中获得资源,造成从被动承受外部负向标签到主动脱离社会生活,完成从被边缘化到自我社会疏离的完整路径。

5. 社会工作干预的路径优化

5.1. 重构积极的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与内化标签是社会疏离的核心,也是社会工作干预的突破口。社会工作者可运用叙事疗法、优势视角理论开展个案介入,在进行个案访谈时作为一名忠实倾听者,充分运用同感和鼓励的技巧,通过直接的介入服务去引导困境家庭青少年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重构正向自我认知,让其明白家庭困境是结构性外部问题,而非个人缺陷,从根源上消解内化的负面标签,破除社会疏离的心理根基。高校可以为困境家庭学生建立一个心理档案,让他们意识到物质上的困难是暂时的,客观地分析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引导他们学会自我调适。作为困境家庭青少年应当积极地进行自我认知,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学会运用适当的方式抵御负面标签带来的错误认知,最终学会自我接纳,使自我完整,最终达到自我实现。

5.2. 搭建同辈支持平台

从生态系统理论来说,当困境家庭青少年的家庭处于困境中时,朋辈系统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良好的朋辈系统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好的认知和行为,有助于他们开阔自身视野,培养积极良好的沟通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的乐观感^[16]。在面对同辈群体场域的标签生成时,可设计“反标签”同伴教育活动进行角色互换和情境模拟,让组员体验被标签者的感受。达成同理,进而共同制定小组“去标签”互动规则。针对困境家庭青少年社交回避和同辈联结断裂等问题,可以依托小组工作方法搭建无差别同辈支持平台,设计一个互助成长小组来有效规避因家庭对比带来的标签差异。同辈支持平台的本质功能在于为困境家庭青少年重建信任关系和互惠支持的网络渠道,削减社会资本持续扩散,使其重新回归到同伴群体之中。困境家庭青少年在这样无歧视的小组氛围中可获得正向同辈互动社交体验,由此打破社交回避的恶性循环,让他们能够恢复社交自信,重建良性同辈社交模式,更有利于人际社会联结。

5.3. 营造去标签化的社会环境

去标签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差异,困境家庭青少年的家庭经济条件、学业成绩、行为方式等这些方面

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但将这些等同于“优劣”并用来界定人的价值, 正是标签化的根源所在。社工应致力于推动学校和社区等环境中标签化互动模式的改变, 通过教师反偏见培训提升教育者对学生差异的包容性认知, 避免语言与其他互动中的隐性标签化行为, 弱化差异化身份的公开, 学校以匿名化或一对一沟通替代公开公示, 均衡校内资源分配, 优化帮扶政策的落实方式。同时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方面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家庭困境青少年进行正面的引导, 例如可以鼓励学生将自身的烦恼倾诉出来[17]。在社区层面可通过营造包容的环境氛围, 减少对困境家庭的污名化评价, 减少多场域外部负向标签的生成与加持, 为青少年社会融入营造包容、正向的外部环境。通过不同场域设定正面的标签来激励仍处于困境的青少年, 让他们沿着正面标签的方向来认知自己, 不断完善自己, 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来树立更加光明的形象[18]。

5.4. 优化家庭互动氛围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认知重构协助父母理解不合理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对子女心理健康的伤害, 运用家庭契约促进亲子间的需求表达和协商, 创造正向的互动。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模拟家庭会议、家庭雕塑等治疗模式来加强困境家庭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联结[19]。以亲子沟通辅导、家长赋能讲座等方式, 引导监护人摒弃否定式和打压式教育, 缓解家长自身的焦虑与自卑情绪, 帮助家长建立正向家庭教育理念, 减少家庭内部的自我否定标签传递, 构建温暖的, 具有支持性的亲子互动氛围。家庭氛围的优化不仅有助于预防家庭产生内部负面标签, 也能增强青少年抵御外部标签的能力, 从源头弱化标签内化。

6. 结论与反思

文章基于标签理论视角, 聚焦困境家庭青少年社会疏离问题, 困境家庭青少年的社会疏离并不是个体心理问题导致的单一结果, 而是多场域社会贴标、消极的心理认知内化和行为强化共同作用的社会化问题。多场景生成的外部负向标签为青少年疏离状态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环境基础, 外部偏见与刻板评价持续作用于个体后, 会逐步转化为青少年消极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否定心态, 进而诱发持续性社交回避行为, 并在自我退缩中逐步瓦解同辈、家庭、社区多层社会联结, 最终固化为稳定的社会疏离状态。本研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方法, 从认知重构、同辈支持、环境营造、家庭优化四个维度出发提出轻量化干预路径, 为缓解困境家庭青少年的社会疏离困境, 促进其社会融入提供理论参考与思路。

标签理论能较好解释负向标签建构与标签内化的过程, 但受符号互动视角局限, 对宏观结构性因素解释不足, 仅依靠标签理论无法完整解读困境家庭青少年的处境, 因此研究中运用的社会资本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可以作为一定的补充, 基于个体心理层面的标签内化与社会关系资源减少, 尝试构建整合性分析框架, 以提升对现象的解释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 面对不同的困境类型是否对应不同的疏离路径, 而且并不是所有被贴标签的青少年都会走向社会疏离, 有些个体依靠心理调节能够有效抵抗标签的侵蚀, 这种“韧性”的生成机制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未来的研究可结合实证细化差异化干预策略, 进一步完善困境家庭青少年社会融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参考, 为未成年人保护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 杜本峰, 王翊, 耿蕊. 困境家庭环境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 2020, 44(1): 70-84.
- [2] 周舒阳. 标签理论对家庭变故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启示[J]. 赤子(上中旬), 2015(20): 115.
- [3] 张琳. 个案工作介入农村困境家庭青少年抗逆力提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 郑州大学, 2025.
- [4] Biordi, D.L. and Nicholson, N.R. (2009) Social isolation. Chronic Illness: Impact and Intervention.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85-116.

-
- [5] Finelay, M. and Spencer, R. (2009) Social Isolation Development of an Assessment Tool for HACC Services. Macquarie University Press.
- [6] 陈蔓雯, 吴浩华, 吴艳, 等. 城市留守青少年社会疏离感、歧视知觉与心理韧性水平的关系研究[J]. 心理月刊, 2023, 18(2): 73-76.
- [7] 贾海超. 在标签理论下促进学校教育发展[J]. 新课程(中旬), 2014(1): 9-10.
- [8] [美]贝克尔. 局外人: 越轨的社会学研究[M]. 张默雪,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9] Tannenbaum, F. (1938) Crime and the Commu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1.
<https://doi.org/10.7312/tann90782>
- [10] 杨海莉. 标签理论视角下青少年偏差行为问题研究[J].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30(4): 98-101.
- [11] 曾平, 何丛. 标签理论视域下高校资助工作育人实效提升策略[C]//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6 年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中册). 2026: 158-161.
- [12] 张爱梅. 标签理论视角下青少年越轨心理与行为探究[J]. 人才资源开发, 2017(6): 179-180.
- [13] 冀贞秀. 问题学生标定过程的个案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 [14] 龚雪. 从标签理论视角分析学校场域中学生身份重构的现象[J]. 教育观察, 2012, 1(8): 22-24.
- [15] 高赫骏. 基于标签理论的小学生偏差行为个案研究——以 S 市 D 学校小学生 L 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沈阳化工大学, 2024.
- [16] 郭芳玲, 苏果云. 困境家庭青少年抗逆力提升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1, 42(29): 81-82.
- [17] 伊里夏提·阿里木. 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以乌鲁木齐市 G 中学某个案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19.
- [18] 陈巍.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去标签化”策略研究——基于社会标签理论的视角[J].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18(3): 72-75.
- [19] 刘念. 离婚家庭青少年成长困境与家庭社会工作介入[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5): 31-33.